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本期要目 ——

- 明代嘉湖地区的桑基农业生境
- 从冬麦生育期看明代长江下游地区气候冷暖变化
- 豫章郡得名的历史地理考证
-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
—— 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 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
- 社会史视野下的政区变动
—— 以建国后松政县的两度分合为例
-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
—— 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 说「太常郡」
- 利玛窦、艾儒略世界地图所记几则传说考辨
-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
—— 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

2013 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编委会主任:萧正洪

编委会副主任:侯甬坚 朱士光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双怀 王社教 王尚义 朱士光 辛德勇

李令福 李并成 李孝聪 吴宏岐 周伟洲

侯甬坚 唐晓峰 袁 林 贾二强 徐少华

黄春长 萧正洪 韩茂莉 葛剑雄 蓝 勇

满志敏

执行编委:卜凤贤 王社教 史红帅 吕卓民 刘景纯

李大海 李令福 张 莉 张 萍 侯甬坚

侯海英 徐卫民 萧正洪 黄正林 耿占军

潘 威

主 编:侯甬坚

副 主 编:王社教

编辑部主任:侯海英

目 录

- 明代嘉湖地区的桑基农业生境 王建革(5)
- 从冬麦生育期看明代长江下游地区气候冷暖变化 刘炳涛 满志敏(18)
- 豫章郡得名的历史地理考证 肖华忠 李琦 李青(28)
-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
——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杨光华(36)
- 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 吴宏岐 韩虎泰(50)
- 新刊《舆地志辑注》献疑 陆帅(62)
- 《明史·地理志》所载南川县水系考证 赖锐(73)
- 社会史视野下的政区变动
——以建国后松政县的两度分合为例 徐文彬(77)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

- 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马孟龙(88)
- 说“太常郡” 赵志强(96)
- 1934—1941年西安城区道路工程建设的初步研究 郭世强(103)
-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
- 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任玉雪(115)
- 利玛窦、艾儒略世界地图所记几则传说考辨 王永杰(124)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

- 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 席会东(142)

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动向

- 以《环境史》期刊为中心的探讨 童雪莲 张莉(151)

· 补 白 ·

- 来函照登 (27)

- 《宋史·地理志》南平军名称勘误 康武刚(150)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

——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

席会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提 要] 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和黄河大改道引发了晚清黄河河政管理体制的变革, 河道总督的权力逐渐削弱, 山东巡抚开始在山东河患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 晚清国内外政局和地域官僚集团利益的纠葛延误了黄河河患的治理进度。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收藏有几幅黄河改道图, 分别描绘了晚清黄河改道穿运的情形, 是了解晚清黄河改道和河政运作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 晚清河政 黄河改道图 河道总督 山东巡抚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 (2013) 03-0142-09

[收稿日期] 2012-0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河图研究” (批准号: 12CZS07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水情水志与水法: 清代黄河洪涝灾害预警机制研究” (批准号: 13YJC770064) 成果。

[作者简介] 席会东 (1981—), 男, 河南巩义人,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中欧交流史研究。

清道光朝以后, 黄河河患日益严重。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淤高, 导致黄河从江苏淮安黄运交汇处的清口以下不断决口、泛滥、改道。进而使得黄河下游沿岸地区的地势整体淤高。清咸丰五年 (1855 年), 由于长期淤积, 黄河自开封兰阳县铜瓦厢决口北流, 漫经豫、鲁两省各州县, 至山东张秋镇穿运, 夺大清河至利津县入渤海, 从而改变了几百年来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 并引发了清代河政管理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的变革。咸丰七年 (1857 年), 清政府以江南已无河务而裁撤了江南河道总督及其属员, 终结了南河 (江南黄河)、东河 (河南、山东黄河) 两大河督并立的局面。黄河改道、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都影响了清代黄河图绘制重点和河渠水利舆图类型的演变。咸丰五年以后, 河臣绘制了一批反映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并在张秋镇穿运情形的舆图, 直观而生动地表现了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进程。

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大改道的过程、原因及其影响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就成为历史学者和黄河水利史学者的研究热点问题, 相关成果不胜枚举; 而晚清黄河河政与治河党争问

题，也被学者所关注^①。但既有研究大都是基于传世清代文献及相关档案而做出的，基本没有学者运用清代黄河舆图这一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相关研究；而且，既有研究对晚清河政变革过程中的地域官僚集团间的权力博弈与党争的探讨还不够充分。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所藏的晚清“黄河改道图”为切入点和基本史料，结合《清实录》等传世史料，对晚清黄河决口改道的过程、晚清黄河河政变革的本质及其过程中地域官僚集团的权力博弈情形进行深入探讨。

一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

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坡降变化，曲流河段增多，加速了河口以上河道的淤积。十九世纪以后，下游河道淤废不堪，黄河日渐高悬，决口连年发生，决口河段从黄河入海口开始向上游推移，其中尤以淮安至河口段河患最为频繁。清代道光朝以来，清廷内忧外患，政治局势动荡，治河不力，也加剧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决口。河道自身的变迁规律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已经致使黄河下游河道大决口和大改道不可避免。

嘉庆、道光年间，黄河下游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冲堤、决口之事屡见不鲜。咸丰初年开始的水涨、河决、坝塌现象，奏响了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黄河历史性大决口改道的序曲。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下游的汛水冲决了位于河南兰阳县北岸铜瓦厢的堤岸，在险情环生的铜瓦厢处决口改道，酿成了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黄河巨变。

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之后，当时内忧外患的政局使得清廷延误了堵口时机和治河事宜。一方面，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无暇顾及河工。河督李钧察上奏“顺河筑埝”、“遇湾切滩”、“截断支流”三策，不乏真知灼见，但除“顺河筑埝”一策得到部分实施外，“遇湾切滩”、“截断支流”两策因时局多艰而沦为空言议论，并未真正实施，致使黄河铜瓦厢以下河段一度处于漫流状态，山东境内水灾尤为严重。另一方

面，清廷中央官员以及地方督抚之间的治河之策相互抵牾，难以达成一致，形成决议并有效实施，从而延误了治理的时机，扩大了受灾的时间和范围。总体而言，清朝众臣的治河意见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山东巡抚丁保桢为代表的山东官员，力主堵口，挽黄河恢复南流故道；另一派是以翁同龢、李鸿章为代表的江苏、安徽臣僚则主张顺从河势新道，另筑修堤。双方争执不休，相持不下。两派的争论不仅是由于治河意见不同，还牵涉地方利益纠缠，就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几经争议，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才最终决定放弃黄河故道，沿黄河决口形成的新道修筑堤防。漫流期间黄河下游自身的冲刷和两岸民间所筑民埝堤防的收束，使得黄河下游形成了新河道。1855年之后，清廷内部就是否将黄河徙归故道的问题进行了长达30年的争论，河臣和疆臣藉其间几次决口的契机拨款治河筑堤。光绪二年（1876年）黄河下游新道两岸河堤告成，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完成了对黄河新道两岸民埝的连接和加固，从而宣告了黄河新河道的正式形成。

黄河大改道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从当时国内外整体局势来看，咸丰、同治年间，清廷的施政重点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缓解恶性通货膨胀所引发的严重经济政治危机，维护政权的统一与稳定。黄河改道为患不是心腹之患，在危难关头，在国力逐步衰弱难以兼顾几面

^①对晚清铜瓦厢决口、黄河改道的过程、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众多，兹不赘述；对于晚清黄河河政的研究，主要有韩仲文：《清末黄河改道之争议》，《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0期，第15—43页；颜元亮：《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改新道与复故道的争论》，《黄河史志资料》1988年第3期；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40—51页；王林、万金凤：《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4期，第88—93页；唐博：《铜瓦厢改道后清廷的施政及其得失》，《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4期，第51—53期；贾国静：《黄河铜瓦厢改道后的新旧河道之争》，《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第56—63页；贾国静：《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清廷的应对》，《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5—58页；贾国静：《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论略》，《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69—76页。

的现实面前，清廷基于当时的政局、国家财力和治黄形势而做出“暂行缓堵”的决策。由于清廷履行政府社会经济职责能力的下降，导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黄河治理主要依靠各地地方官员或者乡绅出资捐建、百姓独立修建的“民埝”。以乡绅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悄无声息地充当了治河的主体，事实上部分地取代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央控制力的下降和地方势力的兴起，特别是基层绅权的崛起。

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也改变了清代河政管理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清政府以江南已无河务而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及其所属淮扬、淮海、丰北、萧南、宿南、宿北、桃南、桃北等河道、河厅，改置淮扬徐海兵备道，兼辖河务，终结了江南黄河（简称南河）、河南山东黄河（简称东河）两大河督并立的局面。同治二年（1863年），又裁撤了河南、山东、江苏交界处的兰仪、仪睢、睢宁、商虞、曹考等五个河厅衙署官员。与此同时，由于地方督抚权力的上升，河南、山东巡抚参与辖区内河务管理的力度明显加大，河道总督的权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清廷洋务运动的推行，近代船舰技术渐次引进，海运地位逐渐上升，而原为国之命脉的漕运在清代国家政治关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漕政密切相关的河政地位也随之相对下降。加之此时的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河政与河务在国家政治关怀中的重要性也相对下降，并逐渐边缘化。清朝末年，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与地方督抚权力的上升，以河督为核心的专职河臣体系遭到裁撤，河工和河务均由地方督抚兼理，最终结束了由河臣和疆臣双头共管沿黄州县的“沿黄体制”。

总之，咸丰五年的黄河的铜瓦厢决口和大改道是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既是清朝国力国运的一个转折点，也是黄淮海平原地貌环境、经济社会秩序和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更是清代河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催化剂。

二 黄河改道穿运图与黄运交汇图

咸丰五年的黄河大改道导致了黄河河患中心

的转移，进而引发了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而这两种因素都引发了咸丰朝之后的黄河图绘制重点和河渠水利舆图类型的转变。咸丰五年以后，河臣绘制了一批反映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和在张秋镇穿运情形的黄河改道穿运图。与此同时，黄河夺大清河河道入海，一些描绘大清河的水利舆图也屡有出现。就现存舆图情形来看，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反映黄河穿运或黄运交汇的舆图，其来龙去脉、渊源关系有待于通过舆图相互比堪和文献梳理来进行深入考证。

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咸丰帝发上谕指派三省督抚负责勘灾、赈灾，还任命李钧接替蒋启扬（或作敷）担任河东河道总督，并将因黄河决口、堵塞不力而革职的原任河督蒋启扬和山东巡抚张亮基“发往东河，交河道总督李钧差委”，命两人重点负责勘察新河流向，制定有效的治河方案，以赎前愆。对此情形，《清文宗实录》卷170“咸丰五年六月丙辰”条载：

（咸丰帝）又谕：昨因兰阳汛三堡漫溢，谕令李钧等赶紧堵合，设法协济，并谕令桂良、英桂、崇恩查明被水灾黎，妥为抚恤。因思河工漫口，向来暂开捐例，以济要工。现在军务未竣，部库支绌，无从筹拨。……著李钧与英桂、崇恩悉心妥议，于河南、山东两省，设立捐局。……该河督等接奉此旨后，即将现在如何筹办情形，迅速覆奏，以慰廑念。并着蒋启扬将兰阳汛三堡漫溢处所，绘图贴说奏闻。^①

据此可知，在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大决口后，咸丰帝谕令河臣李钧筹划堵口，河南、山东巡抚勘灾。因清廷忙于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国库空虚，无力拨付赈灾和河工款项，所以令河督李钧与河南巡抚英桂、山东巡抚崇恩开局纳捐，筹措河工经费和物料，并让绅商捐粮救灾，令民间捐铜铸钱，支付工费。他还命前河督蒋启扬绘制“兰阳汛三堡决口形势图”，贴说奏上。河督李钧接旨后，派人查明黄流去路，上折奏明。《清文宗实录》卷173“咸丰五年七月丙戌”条载：

^①《清文宗实录》卷170“咸丰五年六月丁巳”条，《清实录》第4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9—890页。

又谕：李钧奏“查明漫水经由处所一折”，据称黄流先向西北斜注，淹及封邱、祥符二县村庄，复折转东北，漫注兰仪、考城，及直隶长垣等县村落，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等语。黄流泛滥，经行三省地方，小民荡析离居，朕心实深轸念。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需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餉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通，使横流有所归宿，通畅入海，不至旁趋无定，则附近民田庐舍，尚可保卫。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著李钧即派张亮基，带同熟悉河工形势之员，周历查勘，绘图贴说，详细具奏。至被灾之直隶、河南、山东各省，并著桂良、英桂、崇恩各派干员，会同查勘，统俟奏到时，候朕酌核办理。^①

在咸丰五年七月丙戌的上谕中，咸丰帝在知悉黄流形势后，已经意识到堵口挽河复道在当时的局势和情形下极其困难，因此他认为唯有因势利导，让黄河形成新的入海河道，不至四处漫漶，兰阳铜瓦厢的决口就可以暂缓堵塞。为此，他命河督李钧派熟悉河务的张亮基^②带员遍勘黄河现在情形，并令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派员同往勘河，一并绘图贴说呈览。咸丰五年十二月，李钧上折，汇报张亮基奉命勘河绘图的情形，《清文宗实录》卷 187“咸丰五年十二月甲寅”条载：

叠经谕令桂良、英桂、崇恩，各派干员查勘，并令李钧派张亮基前往周历，绘图贴说，奏明办理。昨据李钧奏，经张亮基查明，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形，请飭地方官劝民筑堰切滩、堵截支河……此时惟有遇湾切滩，使河势刷宽取直，并顺河筑堰，堵截支河，为暂救目前之计。^③

根据李钧奏折和咸丰上谕所载，张亮基奉命勘河，绘制有“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形图”。张亮基还提出让地方官劝民筑堰切滩、堵截支河，使河势刷宽取直，并劝导民众顺河筑堰，避免漫流，这一主张得到了咸丰帝的认同。

咸丰谕令直隶、河南、山东督抚一面督促沿河居民筑堰，一面开捐筹措经费。又令河督筹划堵口，并在张秋迤北运河东西两岸缺口及西民堰等处做裹头护埝，在黄流倒漾处筑坝收束，避免黄河倒灌干扰运河。咸丰帝还命直隶、山东官吏协同勘河，堵塞定陶县黄河支流，加筑曹州护城堤。

张亮基奉命勘河后绘制的“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形图”，应该正是反映咸丰五年间“黄河改道穿运入海的情形图”。此后几年间，专职河臣和地方疆臣另绘呈过一系列表现山东黄、运河势的舆图。如咸丰六年八月丙午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和山东巡抚崇恩绘奏的“微山湖形势图”^④，咸丰八年六月乙巳河督李钧和山东巡抚崇恩绘奏的“山东运河形势图”^⑤等，这些舆图都反映了黄河改道之后黄运两河的新形势。

在此背景下，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一批描绘黄河改道和穿运情形及入海新河道的河渠水利图，并有不少流传至今。其中的较有代表性的黄运交汇图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黄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藏有《黄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一幅，未注撰者、绘制年代和比例，纸本彩绘，图幅纵横 48.5×72.5 厘米。该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以形象画法详绘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东北流经张秋镇穿运河后，自兰仪县龙门镇至东阿县夺大清河入海的情形，黄河决口处、穿运处是图上表现的重点。图中以方形符号表示省城和府城，菱形表示州城，椭圆表示县城，以土黄色双曲线绘出黄河河道，草绿色线条绘出大清河、运河、卫河河道，并帖黄签注明黄河及大清河宽

^①《清文宗实录》卷 173“咸丰五年七月丙戌”条，《清实录》第 42 册，第 927—928 页。

^②按，张亮基（1807—1871），江苏铜山（今徐州）人，因其曾于道光年间协助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治河，熟悉河南黄河情势，故咸丰帝命其协助李钧勘河。

^③《清文宗实录》卷 187“咸丰五年十二月乙卯”条，《清实录》第 42 册，第 1096 页。

^④《清文宗实录》卷 206“咸丰六年八月丙午”条，《清实录》第 43 册，第 247 页。

^⑤《清文宗实录》卷 256“咸丰八年六月乙巳”条，《清实录》第 43 册，第 964 页。

窄、涨伏、水深、河槽状况，是否能够行船等水文信息，两岸堤埝的位置、长度等水利工程情形的描绘尤为详尽。

关于此图的绘制年代和绘制者，图中有一帖签注有“前兰阳漫溢，彼时大清河窄浅不足容纳，以至漫衍。今勘得已刷成深槽，被淹各州县民田涸复，得种菽麦，秋后倍收，皆成美壤。惟间有大清河盛涨时，将山水归河去路擎托，少淹民田耳。”据理推断，黄河夺大清河后刷深河槽、受淹州县洪水退却、民田复种的时间距离铜瓦厢决口北流，淹没山东州县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此图的绘制时间当在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以后，应该是河臣奉命勘验黄河决口北流后的黄河水势情形图。另外，图中所绘的京杭运河的张秋镇段运河河道虽然被多条黄河决流切穿，但是尚未淤塞，陶城埠新运河尚未开凿。据此可知，此图绘制时间在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之前。从图上描绘内容和贴签注记来看，此图很有可能就是咸丰五年七月至十二月间张亮基奉命勘河后，于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绘制呈送的描绘“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形”的河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的黄河图，李孝聪先生将其定名为“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并对图上内容和绘制年代进行了详细考证，兹扼要誉录于下：

（清）曾国荃编制，清光绪初年（1875—1876年）纸本彩绘，未注比例，56×71厘米。该图用黄缎面封，墨书“臣曾国荃恭呈御览”，系曾国荃提交皇廷的呈折。该图以上为南方，描绘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东北流穿运河以后，自兰仪县溃口龙门至东阿县大清河交汇处的黄河泛道，及其两岸的堤埝形势。贴黄墨书注记修筑堤堰埝坝的位置、长度等工程状况。图内京杭运河张秋镇运河河道虽然被多条黄河决流切穿，但是尚未淤塞，陶城埠还未开凿新运河。曾国荃于光绪元年（1875年）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主持黄河堤防的维护抢修；光绪三年（1877年）转任山西巡抚。所以，这幅由曾国荃签署呈送的黄河堤坝修筑工程图贴说应绘制于曾氏在河督任上，即

1875至1876年间。^①

曾国荃（1824—1890），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率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著称于世。光绪二年，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曾国荃上奏“查勘应修黄河南岸长堤及设官修守疏”，详细记述他在光绪二年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时，奉光绪上谕和工部咨文，委员勘测“自兰阳汛十堡起，至运口十里堡止”，长三百里的黄河河道，将此段堤防应行修补之处和设立厅汛吏员的情形逐一说明，并将相关情形缮写清单、绘图呈览，其疏文略云：

窃臣前准部咨，钦奉上谕：丁宝楨奏“现办堤坝两工情形请设立厅汛一折”，该部会同河东河道总督，妥议具奏，钦此。部臣以黄河水势何处险要，厅汛应设何处，未便悬拟。令臣详细履勘，体察情形，专折覆奏，再行核办。奉文之际，时值大汛，臣正在黄河上游，督饬修防，奏明暂缓赴东。嗣于霜清后，赴济宁阅伍查勘运道，即亲履堤工，委员逐段丈量。自兰阳汛十堡起，至运口十里堡止，计程三百余里。内惟菏泽县新工下首堤工，共一百九十余里，顶宽三丈，底宽十丈，高一丈四尺。系贾工合龙后，丁宝楨督率办成者，屹峙整齐，堪资防守。惟切近大河迎溜坐湾之处，尚宜酌量帮宽。其余民埝，或高宽数尺至丈余不等。且土性沙松，已难拦御汛水。而兰阳口门以下，至长垣县境七十里，则尚无堤岸。如设官防守，须先将该处兴筑堤工，并将民埝卑窄段落，一律帮培高厚，再行设官，方免下防上溢之虞。……河南兰仪境内应筑堤二十里，直隶长垣境内应筑堤五十里，及该上下首并东境内卑窄堤工应行帮培者，亦复不少。……至于北岸，地势本高，且有旧日金堤屹峙于二十里之后，实足借资卫护北岸土地人民。日下先其所急，理宜防守南堤，为保全山东运道及江北财富之区。一俟各工办理完竣，便可设官照旧修守。惟念国家制用有常，设官则经费难筹。如将从前裁撤干河厅员各缺

^①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及已裁卡夫，酌量移复，以免另行添设，为力较易，而为费亦较省。……所有遵议补堤设官缘由，理合逐条陈明，并缮清单，绘图贴说，恭呈御览。^①

在其奏疏之中，曾国荃先叙述了其勘河的缘起，后陈奏兰阳铜瓦厢以下新河道两岸堤防情形，提出了先修缮堤防、再设官防守的主张；并建议先防守黄河南岸，保全山东运道与江苏北部财富之区；最后他提出将因黄河改道北流而裁撤的江南黄河干河厅员和卡夫，酌情移至河南山东新河道复设。从曾国荃奏疏内容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的内容来看，两者所叙述和描述的范围完全一致，表现的重点也正相符合。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之图应该就是曾国荃于光绪二年绘制随其“查勘应修黄河南岸长堤及设官修守疏”一并上奏之图。

该图与上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咸丰年间《黄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在基本内容与绘法诸多类似之处。两者的主要不同之处是，该图较国图藏图的绘制更为精细。两图的注记内容和帖签内容也有所不同，如国图藏图中的河南、山东省城仅分别标注“河南省城”和“山东省城”，而国会图书馆所藏曾国荃呈绘之图中则分别标注为“开封府、祥符县”和“济南府、历城县”。另外，两图中黄河在利津县牡蛎海口入海口的的位置也有差异。

总体来看，曾国荃河图反映了光绪二年前后的河道情势和工程情形，图上内容晚于国图所藏咸丰五年左右绘制之图，在内容上两图应属同一主题和性质的河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很有可能参照过国图藏图，或在其基础上绘制而成。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另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的河图，李孝聪将其定名为“铜瓦厢至海口新黄河河道堤工形势图”，并对图上内容和绘制年代进行了详细考证，兹誉录如下：

清后期（1881—1899），纸本彩绘，2幅，无图题，不注比例；红锦缎拓裱，折叠为呈送折状，一幅53×53厘米，另一幅54×52厘米。该图以上为南方，描绘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穿行运河，东北流经山东省入海的情况。覆盖范

围：右起河南省兰仪县铜瓦厢，左止于黄河入海口。以齐河县上、下河道分幅，但是这两幅图并不能完全拼接。着重描绘黄河新河道的干流、汊流和泛道，黄河穿过运河处的新、旧运河的形势，山东省新黄河河道的堤、埝工程情况，标志出沿河府、州、县城的位置。双线黄色表示黄河，浅棕色点状条纹表示黄河泛流，蓝色表示运河与其它河流，深棕色线条代表堤埝，用不同符号区别各级城市。贴红签墨书注记修筑堤、埝的位置，河道的淤塞状况。……显然该图是报送上级主管衙署的治河工程图。图内京杭运河张秋镇旧运口已淤，陶城埠新运河口已行水，据此推断该图应绘制于光绪七年（1881年）改新运口工程之后。^②

今检清代档案和清实录，此图贴签中所述的齐东县何王庄民埝决口发生在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后光绪帝曾下令因此而截留山东漕粮赈灾。据此可知，此图的绘制年代应该在何王庄民埝决口后的第二年，也即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十二年三、四月间，有人因此两次奏劾负责山东河员，光绪帝命山东巡抚张曜核查。张曜回奏何王庄决口并非河员之过^③，但上奏之人仍不甘心，再度点名奏劾，明确指责山东河员潘骏文、豫山等人主要负责山东黄运河治理，“在工甚久”，对于山东濠沟、何王庄民埝、霍家庄官堤的接连决口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山东巡抚张曜经过调查，仍然坚持认为潘骏文、豫山两人“总办全河工程”、“总司局务”、“实心实力”，堪称有功，清廷因此并未采纳对二人的弹劾^④。

潘骏文（1823—1893），安徽泾县茂林人，

①[清]曾国荃：《查勘应修黄河南岸长堤及设官修守疏》，载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22下《地舆部七·河工》，（上海）宝善斋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石印本。

②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第151页。

③《清德宗实录》卷225“光绪十二年三月壬寅”条，《清实录》第55册，第37页；《清德宗实录》卷225“光绪十二年三月甲辰”条，《清实录》第55册，第38—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清德宗实录》卷227“光绪十二年四月辛巳”条，《清实录》第55册，第59页。

是曾任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之子，纳输捐官入仕，先后任刑部郎中、山东青州知府，受到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楨的倚重，让他随同“剿捻”。后因潘骏文谙熟河工，改授兖沂曹济道，主管河道事务。至光绪朝又升为山东按察使，因为处事失误被免职。光绪八、九年间，黄河在山东决口，游百川奉命勘河，奏请开通马颊、徒骇两河，分泄黄河水势，并绘图呈览^①。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力言不可，说马颊、徒骇两河泥沙杂糅，引入黄河水有溃堤之忧，认为黄河宜合不宜分，可再筑一道黄河大堤以收束黄河，并力荐谙习河务的潘骏文治河。潘骏文再度被起用，担任兖沂曹济道道员。他复任后倾心治河，堵住了黄河决口。豫山曾于同治光绪年代先后担任登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山西巡抚等职务，于光绪十一年前后和潘骏文一起负责山东黄运河的治理。因潘骏文、豫山两人任河工局司道大员，所以才屡被弹劾。但事实上，晚清山东黄、运河水患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改道后，清廷无力修筑两岸大堤，山东黄河大堤甫建，堤防并不完善所致，不能一味归咎于河臣治河无能。因此，陈士杰和张曜前后两任山东巡抚都支持了潘骏文和豫山，使其免遭弹劾处罚。在陈士杰与张曜的奏疏中，都记载了潘骏文于光绪十年至十二年间勘河、治河和绘呈河图的情形。

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三十日，光绪帝命军机大臣将吴元炳上奏的“查勘山东河工详陈利病及小清河淤垫请饬筹办”各折片寄给陈士杰，责令其委员勘验办理。陈士杰在收到军机大臣寄发的光绪上谕后，即行抄发给潘骏文、张桐、陈锦等人遵旨勘察办理。时任臬司也即山东提刑按察使司的潘骏文行文回禀山东黄河河患的根源及其治理之策，他指出山东上下游河患不同，应分别采用展宽堤防和收束河道两种不同的策略来治理。之后，潘骏文陈述了山东黄河几处决口的堵复现状，提出了通审全局和提前预防的治理方略，并提出了增培大堤、改筑民埝、修护桩埽、添筑格堤、增筑利津南岸大堤、筑海口两岸长堤、禁盗决大堤、勿轻议改移海口等七条具体的治河措施。陈士杰于光绪十一年上奏“遵旨筹办河防据实直陈疏”，详细汇报遵照办理的情形，突出阐述了潘骏文的治河主张。就此奏疏中

所述内容来看，潘骏文对山东黄河的治理方略和具体措施都极为切中肯綮，无怪乎陈士杰如此倚重潘骏文并尽力奏保他。

从陈士杰的奏文中可以看出，光绪年间山东的黄河治理已经主要由山东巡抚、山东按察使等人负责，而不再主要由河道总督负责。陈士杰的继任者山东巡抚张曜在光绪十二年所上的“查勘山东黄河情形并酌拟办法疏”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东省工程，向有定章，所需经费，应由抚臣核计。从来治河，原无上策。臣智识疏庸，惟有博访周谘，参以成法，就人力所能行，勉为筹计，是否有当，理合绘图贴说，恭折具陈。^②

张曜在其“查勘山东黄河情形并酌拟办法疏”中，详细说明了他勘河的行程路线和所见所闻。他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达武定府，沿徒骇河北岸东行至沾化县流钟镇，再至陈家庙，查看徒骇河河口。之后，他从陈家庙到铁门关，再到萧神庙、牡蛎嘴，查勘黄河河口，发现牡蛎嘴处有铁板沙等漫滩，致使黄河尾闾泄水不畅。接着，他沿黄河北岸西行，经利津、济阳、齐河，查勘徒骇河中段情形，发现黄河北岸决口冲灌徒骇河，附近村落的居民纷纷迁离。之后，他再经沿齐河、长清、东阿北岸黄河，过张秋镇，查勘寿张、范县、濮州和河南滑县的徒骇河上游和金堤。之后，他又沿黄河南岸东行，发现历城以至利津段黄河河面窄而河身高，南岸何王庄至齐东、蒲台均有黄流，受灾严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黄河南岸守遥堤、北岸培筑民埝、裁弯取直、萧神庙至牡蛎嘴挖川字河并加以疏浚等治理措施。其后，他又说明了小清河的情形，回顾了陈士杰、游百川等人的治河主张。在奏文最后，他明确说明光绪年间的山东黄、运河修筑经费都由山东巡抚核计，黄、运河的查勘治

^①《清德宗实录》卷161“光绪九年三月辛丑”条，《清实录》第54册，第264页；《清德宗实录》卷165“光绪九年六月丁卯”条，《清实录》第54册，第315页。

^②[清]陈士杰：《查勘山东黄河情形并酌拟办法疏》，载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22下《地輿部七·河工》。

理由由巡抚“博访周谘，参以成法”来进行。在完成对山东黄河、徒骇河入海之路的查勘后，张曜还负责了“黄河徒骇河入海图”的绘制和呈奏。可以说，光绪年间的山东黄河治理大权已经由河东河道总督转移到了地方督抚手中，这是清晚期河政制度变迁的重要体现。张曜奏文中所述的勘河范围和勘察重点，都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铜瓦厢至海口新黄河河道堤工形势图”相一致，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很有可能就是张曜奏折中所说的随折呈送的黄河图。

其后，张曜又奉命勘察了黄河故道，他指出挽河回复南行故道和分黄流南北入海以减轻山东水患的措施工程浩大、风险极高、难以实行。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光绪帝谕令张曜将其所奏的“遵查山东黄河情形绘图呈览”暨“机器船只做法量为变通”及“查看黄河故道”等各折片中的措施付诸实践。军机大臣将光绪帝所发上谕寄发给张曜，张曜奉命实施，并将其查勘黄河故道的情形，上折回奏，折文略云：

臣查明何王庄漫口情形，于二月二十五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循东、豫干河，至江苏砀山、丰县，入南河地面。往来两岸，详细履勘。……惟臣智识疏浅，思虑难周。是否可行，谨绘图贴说，并缮工程清单，恭折具奏。^①

光绪帝上谕中所说的“遵查山东黄河情形绘图呈览”一折中所说之图，应该就是指上文所述张曜进呈的“山东黄河情形图”，而张曜在此折中所奏上的黄河图应该是描绘从河南、山东至江苏段的“黄河故道图”。张曜所陈奏的山东修筑工程预算得到清廷核准批复后，他委派“司道大员，画分段落，督饬营县，妥筹办理，以专责成，而期核实”，命总办河防局头品顶戴、前按察使潘骏文负责章丘至蒲台南岸大堤与北岸滨惠民埝的修筑^②。据此可知，光绪十二年时，潘骏文已经由山东按察使而改任总办河防局头品顶戴，专门负责山东河务，可见张曜非常倚重他的治河才能。光绪十九年（1893年），潘骏文客死福建，山东士民以其治河有功，请建专祠加以供奉。

除了上述三幅舆图外，属于这种类型的黄河图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所藏的《黄

运交汇图》（1875年）、光绪《黄运交汇图》、光绪《黄河穿运图》，光绪十三年张瀛奎的《铜瓦厢金门以下黄河串运入海情形图》（1887年）、光绪《山东黄水穿运并节次堵口筑堤现在情形图》等。这些舆图都生动描绘了晚清黄河改道与穿运的情形，表现了晚清的黄运河体系变迁与河政体制变革。

三 黄河改道穿运图之意义与价值

咸丰年间张亮基绘呈的《黄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和曾国荃等绘呈的《黄河穿运堤工图说》以黄河改道穿运情形为描绘主题，直观表现了咸丰五年以来黄河改道穿运形成的新河道，是了解咸丰至光绪年间黄河、运河体系大变迁及黄河河政变革的第一手史料。“黄河改道穿运图”直观表现了李钧、张亮基、曾国荃等河臣与山东巡抚崇恩、陈士杰、张曜等疆臣共同治理山东黄、运河的历史，反映了咸丰到光绪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黄河改道穿运图确定了清代后期黄河图的绘制范式，反映了咸丰、光绪朝的河政运作机制与河图绘制运用机制，而“黄河改道穿运图”在海外的流传，则透视着黄河图等中国古地图的管理收藏状况及中国文物在近代颠沛流离的沧桑。黄河改道穿运图的表现范围、绘制技法都是清后期黄河图的典型代表，在清代地图史和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①[清]张曜：《查勘黄河旧道谨拟酌办情形疏》，载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22下《地舆部七·河工》。

^②[清]张曜：《兴办河工委派司道将弁各专责成疏》，载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22下《地舆部七·河工》。